

## 第 2 章

## 俄罗斯转型期死亡危机

2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的男性人口减少了 1000 万。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人口本已超过 1.47 亿，且 1990 ~ 1991 年的人口增长率达 0.3%，与英国持平。但就在 1992 年，俄罗斯人口开始减少。联合国在统计各国人口数据时注意到这一情况，并联系了俄罗斯当地的一个研究小组。<sup>1</sup>

该研究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调研活动。在接触了一些单一重工业定居点后，小组成员观察到一些反常的迹象。这些都是苏维埃政府为了扶植本国军事和经济而设立的一些定居点，计划体制一览无余。根据当时执政者的要求，这些城镇必须实现工业专一化：皮特基亚兰塔成了伐木村；诺里尔斯克变成了大型镍矿厂；西伯利亚的几个地区包括卡达柯被设计成煤矿城镇。煤矿城镇卡达柯位于西伯利亚的马加丹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给苏联军队供给充足的煤，斯大林让战俘修建了该城镇，城镇里的一切都围绕着煤运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意识到应该为居民提供一切配套设施，便在工厂附近

修建学校和医院，为工人及其家属解决住房问题，甚至兴建了周末度假村。所有的生活基本设施一应俱全，其目的只有一个——为苏联政府采煤。

到达卡达柯及其附近的一些城镇后，调查组发现，这些城镇像是经历过切尔诺贝利大灾难一样，像极了荒凉肃杀的鬼城：窗户都遭到了破坏，店铺也不再营业，纷纷被木板围了起来。大量苏联时期的钢厂已经废弃，工厂内部，金属工具已经锈蚀成块，而地面上种满了西红柿和马铃薯，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菜园。

在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些单一产业化城镇的人口根据其产业需求有高达1万~10万的居民，卡达柯的居民就一度达到过11 000人。1989年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城镇的人口降至6000人。但是到了2000年，俄罗斯的人口学家再次统计时发现，卡达柯的居民已经不足1000人。现如今，该城镇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妇女、孩子和老婆婆，他们好奇地透过破败的窗户打量着外面的世界。

男人都去哪里了呢？<sup>2</sup>

答案就蕴含在俄罗斯急剧的转型期，当时其正在迅速向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随之而来的便是大规模的经济崩溃，男性人口的锐减只是其中的一个表象而已。苏联剧变引发了人口危机，这一悲剧至今还在影响着俄罗斯。这种转型期死亡危机并非源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这一决定本身，而在于采用了不当的政策使转变方式出了严重问题。

20世纪90年代早期，俄罗斯的经济体系崩溃了，GDP下降了三成以上，这是工业化国家继美国大萧条之后最大规模的经济灾难。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罗斯的经济购买力下滑到美国 1987 年的水平。苏联时期的官方统计结果为零失业率，但在 1998 年，俄罗斯的失业率已高达 22%。根据 1995 年的官方统计结果，俄罗斯全国有 1/4 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而民间统计结果则显示有 4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苏联剧变 10 年后，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4 的人口每天生活费在 2 美元以下，还有一些苏联共和国的居民则称他们连身体所需的基本营养都维持不了。<sup>3</sup>

苏联解体后，这些城镇任何一个工厂的倒闭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连锁反应，因为这些工厂之间相互提供垄断性的原料和零部件，这是世界其他任何工厂都无法替代生产的。这样一来，当一个工厂开始走下坡路，它所依赖的工业城市就会随之破产。事实上，一夜之间，这些单一工业城镇便不复存在了。城镇的居民被困在遥远的西伯利亚，距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有上千里的距离。为了生存，他们只好吃土豆皮或是靠森林里采集的树根和野浆果果腹。除此之外，他们内心还有无穷无尽的无聊和厌倦，感到无事可做、无路可走，对未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sup>4</sup>

男性死亡率正是在俄罗斯急剧转型期不断上升的。俄罗斯的经济体制转向市场化之后，人口开始减少的群体不是老弱病残者，而是城镇的男性，而这些青壮年本该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1985 年苏联的劳动力人口为 1.49 亿，据美国人口调查局预测，这一数字在 1998 年会增长到 1.64 亿，但实际上，1998 年俄罗斯的劳动力人口下降到了 1.44 亿。<sup>5</sup>

1999 年这一数据公布不久，联合国调查组很快发布了官方报告，称“苏联剧变对很多苏联民众来说确实是致命一击，苏联正在经受一

场人口危机”。从图 2-1 可以看出，1991 ~ 1994 年，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从 64 岁下降到 57 岁。<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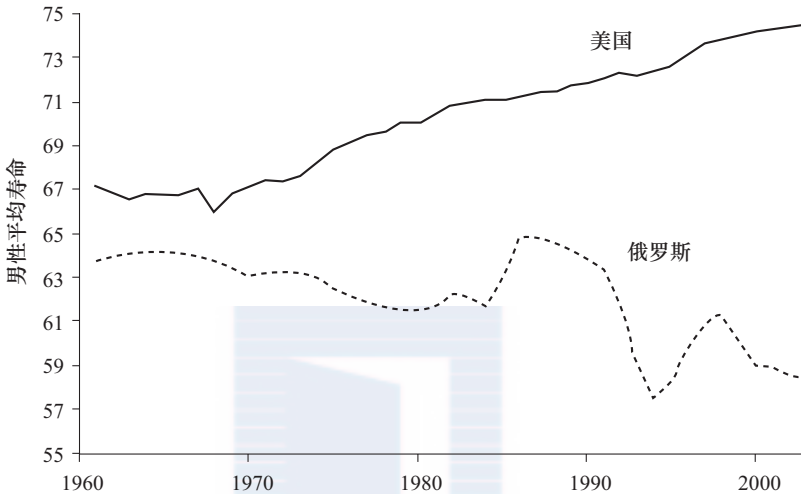


图 2-1 俄罗斯转型期死亡危机<sup>7</sup>

这就是俄罗斯转型期的死亡危机，也是过去的半个世纪人类平均寿命下降最糟糕的时期。而且，它发生的国家既非战争多发区，又非饥荒发生地。<sup>8</sup>

但是，单一工业化城镇的经济崩溃和人口死亡率的急剧上升之间并非是直接发生关联的。我们从经济大萧条已经得知，即使是严重的股市崩盘也未必引发死亡危机。如果说经济崩溃并非死亡率上升的原因，那么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经济萧条期间，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俄罗斯男性人口的生命？于是，我们着手调查。翻阅这一时期的死亡证明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些数据可能并不真实。可能这些男性早就被杀害了，只是这些数据直到现在才对外公开，让法国和苏联的人口学家有据可依；又或许，为了以强大的参军队伍来震慑西方，苏联政府虚报了本国的男性人口数据（这一猜测并非牵强附会：1976 年

苏联设立了关于非公开数据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提到：“我们一定不能公开本国男性出生人口，一定要将此作为国家机密，因为敌人可能会利用这一信息。”<sup>9</sup>

为了查清楚俄罗斯死亡率上升这一情况是否属实，我们仔细翻阅了苏联解体前的人口死亡证明。在新政府的人口管理机构即国家统计局委员会的档案馆里，我们得到了一些确切数据：国内90%以上的死亡是由有合格资质的医生检查和确认，并准确判定死亡原因，而且死亡率确实比很多西方国家要高。<sup>10</sup>

我们知道疾病大都倾向于发生在体弱人群中，比如婴儿和老人，而俄罗斯死亡危机却有一个反常的特点：死亡人口主要是能够从事工作的青壮年。25 ~ 39岁正是男性一生中最好的光景，但这个年龄段的群体死亡率却出乎意料地上升了90%。

也许当时苏联国内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流感或是其他传染病，或是一场严重的饥荒，或是工厂排出的不明污染物等导致了高死亡率。但是，据我们和其他很多人口学家从俄罗斯数据机构得到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些假设通通不成立。统计数据显示，很多年轻男性死于酒精中毒、自杀、他杀和伤残。导致这些死亡的原因很明显：工厂倒闭后，很多男性失业了，他们变得焦虑，精神也高度紧张，于是开始酗酒，伤害自己以及他人。

还有很多年轻男性死于心脏病。一开始，这一情况让调查人员着实吃了一惊。根据常识判断，五六十岁的中年人可能会因动脉堵塞而患心脏病，而三四十岁就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应该很少。法医提供的验尸报告显示，这些年轻男性的动脉都很干净，并没有发现血小板积聚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心血管疾病呢？

为了搞清楚俄罗斯令人费解的死亡模式及其根本原因，我们需要调查该国不同层面的健康问题。我们想拨云见日，超越导致人口死亡的表层因素如抽烟、酗酒和不良饮食结构等，找到死亡原因背后的根本因素，弄明白社会和经济变化是如何让人们伤害自己以及他人的。

这些死亡发生得如此之快。所以，起初我们猜测，俄罗斯男性对于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压力有一套“自我疗法”：喝大量伏特加和自酿白酒消愁。俄罗斯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在18世纪，俄国沙皇为遏制民众叛乱，鼓励饮酒，饮酒风气开始盛行。俄语中甚至有一个词“zapoi”，用来描述大醉一次后瘫软数日甚至数周的状态。根据美国医学标准，目前在俄罗斯国内，超过75%的男性属于高危饮酒人群（每天饮酒超过4瓶）。<sup>11</sup>

但凡有社会压力的地方，就有酒的存在。众所周知，酒精是引发抑郁、自杀和他杀的因素。或许，酒精也能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年轻男性动脉运转正常却得了心脏病。心血管病医生都清楚，适量饮酒可以降低心脏病发病的风险，但是过度酗酒则会引发心脏病。<sup>12</sup>

俄罗斯的政治家也曾试图整顿国内的酗酒问题。1985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起了一场反酗酒运动。这场运动立竿见影，立即将国内民众的平均寿命提高了3岁。酗酒死亡人数减少，肺结核和心脏病的发病率也大大降低。由于酗酒者居住条件拥挤，经常感染肺结核，加上饮酒过度会导致心脏病的发病率上升，因此禁酒运动大大降低了这两种病的患病风险。但是，此次运动并不受欢迎，而政府也企图利用酒来增加财政税收，于是该运动于1987年被废止了。在这之后，饮酒人口再度增加。所以，1992年，在俄罗斯开始

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俄罗斯的酗酒死亡率又恢复到了1985年以前的高水平。<sup>13</sup>

更令人担忧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男性的饮酒不仅在量上加大了，在酒的种类上也杂乱起来。俄罗斯男性大部分已失业，但他们极具创造力地发明了一种不用花多少钱就能放纵一把的好方法。在当时的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有一种出于商业目的而生产的“酒”，这种酒是用剃须液、漱口水等包含酒精成分的物质勾兑而成的。与伏特加和白酒相比，这类酒被称为“Odekolon”，价格便宜，而且不收商品税。市场上，商家以香水的名义出售这种酒，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标的是气味，卖的实际上是口感；而且，瓶子顶部带有拉环，很方便消费者打开一饮而尽。这类饮品有致命的危险，一项调查结果证实，此种酒会引发酒精中毒性精神病、肝硬化及心脏病，其死亡几率比正常饮酒情况下高出26%。<sup>14</sup>

弗拉基米尔就喝过这种酒。弗拉基米尔来自皮特基亚兰塔，村子的造纸厂倒闭后，他失业了，他的经历活脱脱地体现了当时的酒风。他曾在整整两周之内不断地喝酒，一度酩酊大醉地昏倒在村子废弃工厂的地板上，并经常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弗拉基米尔喝廉价的Odekolon，而更多的乡下人喝的是一种叫做“Samogons”的自制蒸馏啤酒。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很多像弗拉基米尔这样的人，尽管他们已经几乎没有收入，饮酒却越来越厉害。弗拉基米尔曾接受过《纽约时报》的采访，当被问到为什么一直喝酒时，他说道：“我也说不清楚。我有家，却一事无成。”<sup>15</sup>

在俄罗斯，有成千上万像弗拉基米尔这样的男人，他们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没有工作，百无聊赖，又无处可去，Odekolon恰恰就

是最便宜的发泄途径。当时，每12个俄罗斯年轻男性中就有1人在喝这种有毒的酒。就业男性中，5%的人喝过这种酒，而在失业男性中，这一比例达到25%。仅凭这组数据，我们还不能确定酗酒和失业是否相互影响，但这两个因素相互之间的作用确实很具毁灭性，尤其是重度酗酒且是这种有毒的酒，着实令人吃惊。在伊热夫斯克，过半男性的死亡与有害饮酒有关，过度酗酒并沉溺于这种有毒的酒类替代品。据测算，20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劳动年龄男性死亡人数的2/5与酗酒有关系，俄罗斯的酗酒死亡人数总体上达到400万。<sup>16</sup>

为了探究这种现象造成的全面影响，我们查阅了《俄罗斯纵向监测调查》发布的数据，这项调查跟踪报道了男性群体及其家庭在1994~2006年的情况。运用生存分析技术，我们关注了6586位男性，这些人在1994年都属于就业人口，其中有593人死亡。接下来，我们着手评估最能预测存亡的因素。数据显示，在6586位被调查男性中，体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最有可能饮用伏特加或勾兑产品，他们同时也是最有可能死亡的人群。1994~2006年，工人阶层死亡率和管理阶层死亡率之间的差距大幅加大。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纵向监测调查》专门问及受试者对社会地位和社会压力的看法。结果发现，与有权有势的富人相比，经济地位最低下、没有任何权力并最得不到尊重的弱势人群的死亡几率是他们的3倍。总体来看，俄罗斯工厂里一名21岁的普通工人的预期寿命为56岁，这比经理和专业人士的预期寿命要少15岁。<sup>17</sup>

但是，最容易死亡的其实是像弗拉基米尔那样的失业男性，这类人群的死亡率是就业人员的6倍。失业本身可能并不足以对一个人的健康造成致命伤害，但我们要清楚，在苏联，失业同时意味着失去了在社区及社会附带的安全保障。苏联时期，就业并不仅仅意味着获



取收入和实现生存目的。苏联的就业状况和西方工厂的截然不同。苏联虽然权力至上，实行流水线生产，但也有一些特有的福利措施。苏联的就业人员可以享受便利的医疗条件、糖尿病检测、育儿及很多其他社会保障。父母进入工厂做工的话，儿女就可以玩耍了，而且父母的工作强度也不大。工人们开玩笑说：“我们做出工作的样子，政府做出发薪的样子。”情况确实如此。人们挣的钱不多，但他们确实有稳定的工作，能享受一些政府福利。对苏联的工人及其家庭来说，这些福利项目都是免费的。在苏联，单一工业化城镇的人们都有很强的社区感，作为社区的一分子，不管是否乐意，他们都在这个团体之中。<sup>18</sup>

死亡率的攀升已成既定事实，当下的关键问题是探索怎样防止这些本可以避免的伤害。很多人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这种不正常的高死亡率是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调查也揭示了俄罗斯新近失业男性中的死亡率上升现象。结果一经公布，《纽约时报》的一位分析人士问到一个问题：在俄罗斯政治体制过渡时期，死亡危机是否是人们无法预见的必然结果？换言之，俄罗斯转型期人们健康状况恶化、死亡率上升是否是不可避免的？这一问题确实至关重要。为了寻求答案，我们查阅了苏联及其阵营成员国这方面的数据。如果在政治体制的转型期，压力引发的死亡真的是无法避免，那么所有经历这些转型期的国家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应该大幅升高。<sup>19</sup>

结果却显示，并非每个国家的死亡率都升高了。波兰人民健康状况比之前更好，俄罗斯则出现了下滑。而1991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前，俄罗斯和波兰的死亡率是很接近的。但是3年后，俄罗斯国内死亡率上升了35%，波兰的死亡率却下滑了10%。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情况与俄罗斯很相像，死亡率大幅上升，而白俄罗

斯、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出现这种现象。

这些差异关键是和社会转型期政府的政策抉择有关，选择合适的政策调整改革步伐至关重要。那些追求政治体制快速而急剧转变的国家实行极端私有化计划，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接二连三地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脱轨。最终，“激进私有化者”所在国家的民众健康状况要比“渐进过渡者”的糟糕得多。这是因为，“渐进过渡者”放慢了改革步伐，维系了社会保障体制，因此在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改善了人们的健康状况。

苏联即将解体之时，针对怎样转变政治体制这一问题，俄罗斯及西方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展开了一场辩论。当时，国内面包店被抢购一空，肉类、牛奶和火柴等都供不应求，计划经济已经穷途末路，改革迫在眉睫。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苏联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确实进行了一些渐进式的公开性改革。苏联解体后，辩论的核心问题是改革的方式及速度。

关于改革的速度，经济学家意见不一。自由市场化倡议者认为改革进行得越快越好，他们提倡“休克疗法”，这是一套激进的市场改革方案。这些倡议者大多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有安德鲁·施莱弗、斯坦利·费希尔、劳伦斯·萨默斯、杰弗里·萨克斯和俄罗斯代总理及经济学家叶戈尔·盖达尔。

这些激进改革者称，市场化改革进行得越快，经济效益就会来得越快。这样，苏联工厂会获得新生，人们也会干劲更足，收入更丰，苏联也将顺利走出泥淖。根据世界银行经济转型组成员的分析，政治体制转变催生了一个“异常政治”时期，政治家可能会让民众做出巨大牺牲。对民众来说，这种激进型的经济改革是摧残人的，因为它剥

夺了他们之前享受的所有社会保障权利，但在改革者看来，如果不加快改革步伐，转型很可能会功亏一篑。这种策略实际上是想拿短期的痛苦来换取长期的收益。从本质上看，这场改革是个政治计划，意在让新的政治体制在俄罗斯站稳脚跟。当局者认为，俄罗斯一旦建立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就绝不能再被推翻。<sup>20</sup>

杰弗里·萨克斯是“休克疗法”的主要倡导者之一。1990年1月，杰弗里·萨克斯发表了影响力颇大的文章《怎么办》，该文沿用了90年前弗拉基米尔·列宁同志为1917年“十月革命”及共产主义诞生所写的文章题目《怎么办》。<sup>21</sup>杰弗里·萨克斯的《怎么办》提出了“休克疗法”的计划，提议立即实施一系列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

“休克疗法”有两大要素。第一个是经济自由化，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取消对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管制。苏联对一切实行管制，从工人挣的工资到城镇的面包价格都严加控制。“休克疗法”倡导者认为，若要市场发挥其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俄罗斯的发展，政府必须终止这种管制。<sup>22</sup>

第二个便是大规模私有化，减弱政府影响，刺激市场利益，要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卖给市场。这是最有争议也最令人痛苦的政策，但很多经济学家将其视为解决问题的良方。激进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休克疗法之父”米尔顿·弗里德曼简明有力的口号“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化……”迅速解除了苏联政府对经济的管控。然而，这样一来，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在原苏联，政府用于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直接来自国有企业的税收。大规模的私有化不仅造成工人失业，还大大削弱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sup>23</sup>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尝试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国家经济全盘私

有化。伟大的私有制改革者、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位期间，用了11年的时间将国内20家大型国企推向市场，实行私有化，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居然试图在不足500天的时间内，将20多万苏联国企全部私有化。他们还声称，改革速度很关键，否则新的政治体制会朝不保夕，历史会重蹈覆辙。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克斯曾谈到：“众所周知，经济学家根本无法就一件事情达成共识。但奇怪的是，关于东欧和苏联的经济转型方案，他们居然全票通过。”<sup>24</sup>

事实上，也有人不赞同“休克疗法”。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并于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他为代表的“渐进过渡者”认为资本主义并非一夜之间成型的，西欧的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发展成熟就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斯蒂格利茨等人呼吁放慢东欧国家市场化和财产私有化的步伐，要假以时日发展管理机构和政策法规，确保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而不是被金融寡头垄断。他们倡导东欧国家采取“双轨体系”模式，逐渐摆脱计划经济体制，让私营企业最终超过陈旧的国有企业，从而过渡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sup>25</sup>

为了解决争执，1991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提议做笔大买卖。如果苏联等国采取“休克疗法”，美国政府将向这些国家的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提供总额约6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作为交换，西方社会将享有军事特权，并加强对苏联外交的干涉。美国国际发展机构是首席经济援助方，仅此一家就为苏联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近10亿美元资金。但是，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呼吁放慢改革速度，而他的政敌叶利钦则支持美国这一计划。“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计划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叶利钦的干涉。此后，戈尔巴乔夫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整个苏联气数将尽。1991年10月，叶利钦解散了苏联共产党。1991年12月25日，苏联

解体。<sup>26</sup>

这一政治局面改变了苏联的势力均衡状态，戈尔巴乔夫放慢改革进度的计划遭冷落，而“休克疗法”则大行其道。不仅俄罗斯如此，苏联的很多成员国采取了“休克疗法”。1994年，“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及其他苏联共和国诸如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全面实行。不过，有些国家比如白俄罗斯的政要人物决定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这些背景相似的国家最终踏上了不同的改革之路，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天然实验”。在这场实验中，情况相似的人们经历了不同的改革模式并最终面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最终陷入了灾难性的境地。如图 2-2 所示，1990 ~ 1996 年，在俄罗斯及实行“休克疗法”的大部分东欧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直线下降 30%，仅比大萧条时期稍微乐观一些；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俄罗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经济能力跌至美国在 1897 年的水平。<sup>2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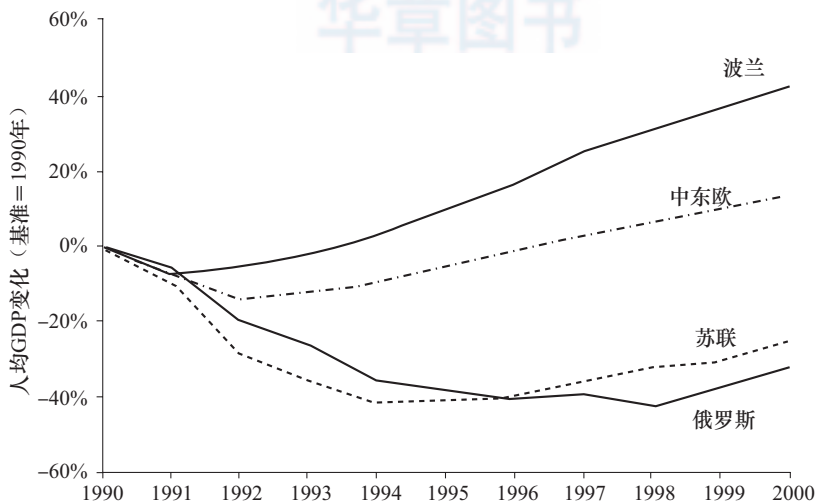


图 2-2 俄罗斯及苏联经济的崩溃以及中东欧经济的快速恢复<sup>28</sup>

大规模私有化作为“休克疗法”的主要支撑，本意是要解除党派对经济的掌控，但在俄罗斯，却事与愿违。大量国家财富被前执政党的精英人士控制，产生了寡头经济，社会不公平现象日益严重。最终，受苦的还是人民大众。1987 ~ 1988年，俄罗斯的贫困率为2%，但在1995年，贫困率超过了40%。1992年，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将叶利钦的经济改革称为“经济大屠杀”。<sup>29</sup>

但是，并非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俄罗斯的邻国白俄罗斯就走了渐进式的发展道路。在国家转型期，白俄罗斯的贫困率保持在2%以下，失业率达到峰值4%之后就下降。如今，白俄罗斯的失业率低于1%。纵观1989 ~ 2002年东欧25个转型期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我们发现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比实行渐进式改革国家的男性失业率高出了56%。

而波兰的改革经历则表明，私有化的弊端并非无法避免。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过激过快而使企业所有权不明。作为东欧剧变时期的风云角色，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也经历了高节奏的经济自由化，但随后，在工会和愤怒的抗议者的双重压力下，推迟了大规模私有化的进程。捷克共和国也有很多人提议私有化，国家也曾进行过一些尝试，但由于90年代中期工会的抗议，部分改革计划被取消了。私有化节奏的放慢对经济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型钢厂私有化速度放慢，为国家更好地吸引国外投资者创造了条件。不像俄罗斯的企业家在接管工厂后只是简单地注入大量个人资本实现私有化，这些国外投资者对购入企业采取战略的眼光实行策略性投资。1990 ~ 2005年，波兰吸引了大众公司以及其他共计89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同样，在捷克，就国有汽车制造公司斯科达的收购权问题，德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和大众集团展开了竞争。1991年，

大众集团中标，与捷克政府达成合资协议。斯科达企业曾是汽车行业的笑柄，但在大众集团的扶植下，斯科达汽车很快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如今，斯科达每年的销量超过 875 000 台。<sup>30</sup>

体制的转变对于苏联阵营的任何一个成员国来讲，都意味着痛苦。但是，若采取渐进的方式转变，痛苦便不至于那么可怕、那么长久。一开始，通过循序渐进的私有化进程吸引外资的东欧及中欧国家也如苏联国家一样，经历了经济衰退，但这些国家都最终避免了俄罗斯及其他激进式改革的国家所遭受的大规模的经济萧条。

快速实施大规模私有化的目的在于打破苏联政府对经济的掌控，这种掌控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政治腐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快速私有化后，这种腐败反而更加严重了。在私有化的黑幕交易中，很多内部人士接手工厂后不但不进行投资，反而倒卖并交易公司财产，然后存入瑞士的银行账户。为探究这些企业的具体情况，我们调查了政治体制转型后 24 个国家的 3550 家公司，观察其管理阶层的情况。结果发现，面向国外投资者私有化的企业都经历了重组，企业竞争力增强，投资额度和就业率都随之提高，这便是大众在东欧经历的发展模式。而相比之下，俄罗斯国内的大规模私有化并未像预期那样促进经济繁荣，反而因大面积的贪污受贿和资产倒卖而引发了经济崩溃。大规模的私有化导致了长期的经济停滞，经济严重受挫，产值下降了 16%，这一比例与经历大衰退国家出现的情况持平。<sup>31</sup>

对于政治体制的剧变，东欧各国采取的不同经济措施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对人民的健康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们比较了 1989 ~ 2002 年东欧各国的人口健康状况数据，发现快速私有化对人民健康带来了两大主要威胁：人们不仅失去了工作，还一夜之间被剥

夺了各种社会保障权利，这无疑是在雪上加霜。<sup>32</sup>

作为最支持大规模私有化的金融机构，世界银行也意识到了改革对民众健康的危害。1997年，世界银行宣称：“苏联各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政体，必会改善民众健康状况，但在此之前的过渡期内，肯定会出现短期的健康恶化现象，这是前提条件。”<sup>33</sup>

杰弗里·萨克斯也声称：“快速过渡将促进经济增长，并降低对民众健康的损害。”萨克斯的语气很坚决，但相关数据却显示俄罗斯人民着实经历了越来越糟糕的贫困和苦难。1995年，杰弗里·萨克斯自己也承认，“休克疗法”确实给工厂工人带去了很多压力和焦虑感，它成就了一些人，也打垮了一些人，但他仍然坚信，从长远看，这一情况终将改善：“即使改革没有真正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也一样会感到恐慌。前期的经济改革确实很残酷，一旦引入市场机制，举国上下好像发生了一场全民抢椅子的游戏，相当大一部分人需要寻求新的谋生方式。从长远来看，这种机制对大多数人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体制转型期内，一些人注定会成为改革中的输家，虽然这确实很残酷。”<sup>34</sup>

正如“休克疗法”专家所料，大量私有化让失业率在短期内开始上升，包括公民健康预算在内，政府财政支出削减了20%以上。单一重工业城镇尤为糟糕，大量人口失业，他们吃不饱饭，住不起房，买不起药，甚至无处就医。与“休克疗法”专家预期的恰恰相反，大规模私有化竟然导致了经济萧条。实施大规模私有化的国家经济衰退更为明显，经济恢复更加缓慢，政府在公民医疗保健方面的财政支出也削减得更多，民众在健康方面的情况每况愈下。<sup>35</sup>

俄罗斯的西南邻国白俄罗斯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长一



段时期内，白俄罗斯本是苏联的成员国。1991年俄罗斯实施大量私有化改革之前，白俄罗斯宣布独立。俄罗斯“休克疗法”主要倡导者之一、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艾斯仑德曾把白俄罗斯说成“苏联的主题公园”，这是在讽刺白俄罗斯在私有化方面进度过于缓慢。虽然就国土面积而言，俄罗斯比白俄罗斯大很多，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两国的经济发展及死亡率发展趋势却很相似。两个国家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以往的死亡率方面都很相似，但正是由于对“休克疗法”的选择不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们对发展政策的选择，为我们上演了一场研究大规模私有化对民众健康影响的天然实验。<sup>36</sup>

如图2-3所示，在俄罗斯还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的10年间，两国死亡率情况大致相同。之后，俄罗斯开始实施大规模私有化，两年内卖掉了120 000家公司，之后却陷入贫困状态，死亡率骤增；白俄罗斯在此期间则选择渐进式地发展私有化，贫困人口不到2%，死亡率也保持了之前的状态。<sup>3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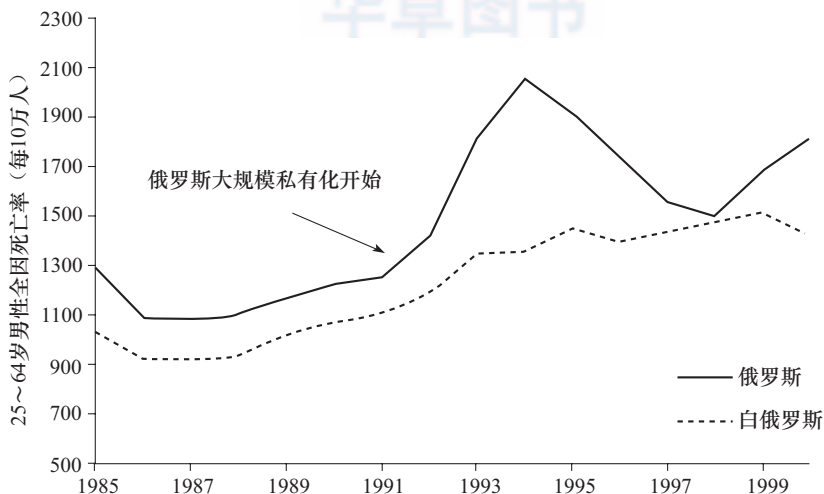


图 2-3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死亡率趋势<sup>38</sup>

这种对比模式并非局限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个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整个东欧地区。短短5年内，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等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人均寿命骤然下降，而白俄罗斯、波兰等渐进式改革的邻国则在公共健康方面要好得多。<sup>39</sup>

不过，经济规模等干扰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结果。因此，我们运用统计模型分析了可能会影响这24个转型后国家经济水平的各种因素，如以往经济危机、民族冲突、军事矛盾、现有发展水平、城市人口比例，还有休克理论中涉及的市场自由化程度、国外投资水平以及其他各种可能影响到结果的因素。即使控制了这些干扰变量之后，我们依然发现，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实施激进的大规模私有化的国家，死亡率在实施“休克疗法”后平均上升了18%，而这一情况在白俄罗斯及波兰等渐进式私有化的国家就没有出现。为确保研究结果的效度，我们调查了理论上不受财政紧缩政策影响的疾病，比如肝癌，这类疾病的发病期通常比较长。结果证明，大规模私有化对这类疾病确实没有产生影响。但是，每10万人中，因大规模私有化造成的男性自杀人口增加了5人，心脏病人口增加了10人，酒类引发的死亡增加了41人。总体而言，人均寿命骤然下降2岁与大规模私有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sup>40</sup>

当然，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也料到了改革所带来的这种短期的痛苦。但根据他们的理论，短期的痛苦会带来长远意义的经济增长，这样一来，就可以弥补普通民众的损失了。如果真如这些专家所言，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死亡率骤增看做短期痛苦的一部分，它最终会引领人们走向美好的未来。公认的“拇指规则”<sup>①</sup>认为，人越富裕就

<sup>①</sup> 又叫“经验法则”，是一种用于许多情况的简单的、经验性的、探索性的，但不是很准确的原则。——译者注

越健康。高收入人群对健康医疗的投资能力强，他们可以选择卫生条件较好、医疗水平更高的医院，吃有上乘价值营养的食物，住在安全系数更高的社区，因此活得更健康。问题是，“休克疗法”为俄罗斯民众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抵消高死亡率付出的代价吗？这毕竟只是“休克疗法”的理论。换句话讲，短期的痛苦真的能带来长远的收益吗？<sup>41</sup>

查阅实际数据后，我们遗憾地发现，大规模私有化并没有加速经济的发展。恰恰相反，它导致 GDP 下降了 16%，相当于让人口平均寿命下降了 2.4 岁。<sup>42</sup>

最后，即使一些最初推崇“休克疗法”的专家也开始意识到，“休克疗法”确实给民众健康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苏联解体后，我一直问自己，苏联人民应该何去何从。当时我提到‘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化’，我错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对的。”<sup>43</sup>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大规模私有化与死亡率骤然上升直接相关这一结果，一些“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迫不及待地站出来为他们的提议辩护，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2009 年 1 月，在英国医学界同行评审的学术刊物《柳叶刀》上，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休克疗法”对民众健康影响的论文。文章发表一周后，萨克斯指出，俄罗斯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是民众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而非“休克疗法”造成的。但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俄罗斯人食用红肉（牛肉、羊肉等）和饱和脂肪的量就在不断增加。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们的饮食结构并未出现骤然的不良变化。还有一些向苏维埃阵营国家倡导大规模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写道，死亡危机可能源于以往所受的污染。但不论什么样的污染情况，总不至于致死的全部为年轻男性。为了进一步探索原因，

有些经济学家宣称饮酒致死始于戈尔巴乔夫“反酗酒运动”结束之后，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反酗酒运动”已经结束很长时间了，而“休克疗法”实施后新增加的死亡人口远比“反酗酒运动”拯救的人口多得多。<sup>44</sup>

之后的反击变得变本加厉。我们的文章发表两周后，一向支持“休克疗法”的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评论，否定了快速私有化对民众健康产生的影响，文章总结到：“导致俄罗斯悲剧的错误不是改革过快，而是过于缓慢。”该杂志编辑对死亡率数据动了手脚，这样看上去好像根本没有发生大规模死亡。他们计算出5年内死亡数据的均值，然后挑选了一些特殊的年份进行观察，这样就让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死亡率走势变得平稳。他们就是使用这种“统计作弊”的方式让本来不断攀升的死亡率走势（见图2-4）变成平稳下降趋势（见图2-5）。如果我们学校的大学生在学期论文中以这种不正当的方式处理数据，早就被送到院长那里接受处分了。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大笔一挥就剥夺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那么《经济学人》的编辑则像是通过轻点鼠标编造数据就让成千上万的死人复活。<sup>4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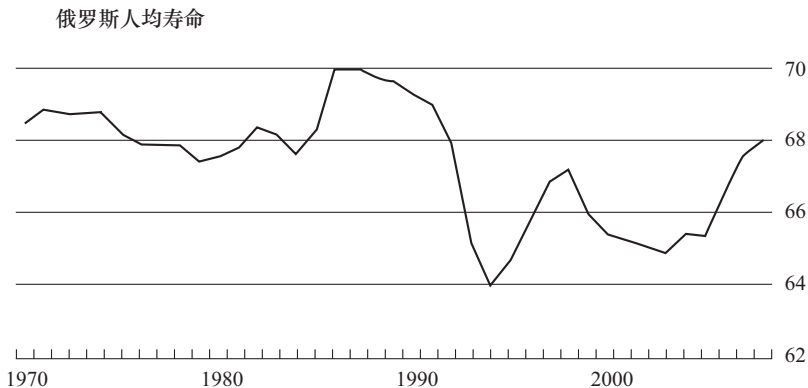


图 2-4 俄罗斯人均寿命：基于真实数据的自制图形<sup>4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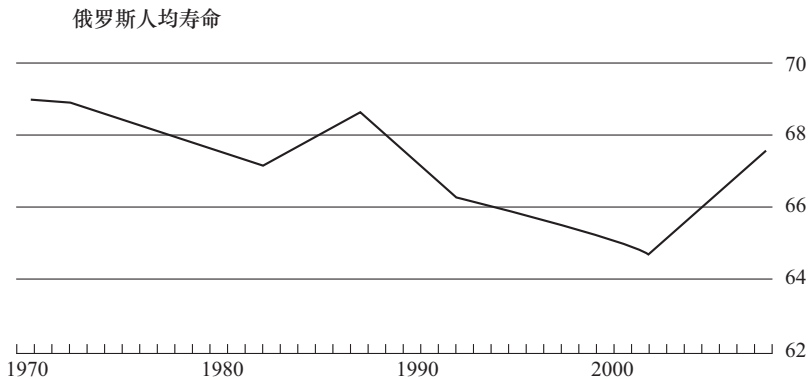


图 2-5 俄罗斯人均寿命：《经济学人》数据处理后的图形<sup>47</sup>

这些试图否定和篡改数据的行为要掩盖的事实正是我们最重要的研究发现：我们该如何防止经济冲击影响民众的健康？<sup>48</sup>

现在距俄罗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 20 年了，但俄罗斯男性的健康状况仍不及 1991 年改革前。1991 年的人均寿命为 68 岁，而 2012 年的人均寿命为 66 岁。当年大批男性的死亡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由于缺乏充足的优质兵源，强大的俄罗斯军方也雄风大减。<sup>49</sup>

“休克疗法”实施后，男性死亡人数大幅增加，民族深受打击。活下来的家庭成员不得不承受家里顶梁柱倒下的打击，妇女们必须独自担起债务重担和家用开支。

虽然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痛苦转变，但这段苦旅将长久地影响俄罗斯人民的健康。由于大规模私有化，俄罗斯行将崩溃的定点医疗诊所体系已经无法控制传染性疾病。一度沉寂的肺结核病卷土重来，发病率在 1992 年开始上升。俄罗斯这个苏维埃阵营国家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一度成为世界上两大无法有效防控肺结核疾病的地区。俄罗斯的情况非常严峻，已经成为新型突变型变体的疾病中心，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抗体，这种“多重抗药体”肺结核对全世

界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sup>50</sup>

当人们最终看清，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并未达成它所宣扬的目标时，它对公共健康的严重损害便更具有悲剧色彩。假如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过渡能够从长远意义上改善俄罗斯的居民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那么1000万死亡人数还能好接受一点。但事实恰恰相反，俄罗斯的私有化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个该民族自有的“1%”现象以及拥有大量财富和权力的少数寡头。

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俄罗斯本来是可以走平缓的私有化之路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拒绝“休克疗法”，而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缓慢有序地放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连年翻倍，即使在2007年经济衰退期间也是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其民众健康也产生了良性影响，目前，中国的健康数据已经可以与一些西方国家相媲美。1985年，中国的人均寿命为67岁，现在已经上升到了73岁。<sup>51</sup>

俄罗斯并不是“休克疗法”的唯一受害者。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及亚洲经历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这些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政策。在应对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经济危机造成的经济和健康问题时，“休克疗法”专家对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计划，使整个国家成为“休克疗法”实验中第二只不幸的“小白鼠”。